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出自《国语·周语下》。意思是说，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造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坠落。这一典故的背景是在东周末年，王子朝叛乱，周敬王被逐出都城，逃到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诸位流亡大臣拟在成周筑城建都。晋国的执政者魏献子赞同，然而卫国大夫彪偃却认为不可，并引用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谚语以及从前历朝历代的教训加以劝止。

这句古谚形象地说明了从善之难、从恶之易，是古代先贤的劝世箴言，为历代政治家所重视。《南史·宋文帝纪》记载，宋文帝刘义隆为倡导新政、荡涤官场的颓废，曾劝诫群臣道：为官从政，切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此后，刘宋政权开启了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从善如登”，为什么为善就像登山一样艰难？因为人要向上攀登，必须不断地克服地球的引力。这里的“引力”可比喻为人修身必须克服的各种诱惑、吸引。例如，财色名利这四大诱惑时时刻刻吸引人向下堕落。因此，一个人要向善并不容易，需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习气。而习气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要克服它同样需要一个过程。相反，“从恶如崩”，为恶就像山崩那样迅速，甚至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因为山崩塌的时候，会因地心引力的作用而迅速坠落。



□ 刘余莉

朱熹云：“要做好人，则上面煞有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攀跻，分寸不得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学者可不畏哉？”朱子提醒学人，做好人不易，要时刻警醒自己。好人有很多等级：君子、贤人、圣人，而君子、贤人、圣人之中还有很多等级，可见做好人实在不易。所以古人提醒，“德比于上故知耻”。在德行方面要跟上面的圣贤相比，他们早已成圣成贤，而自己还是凡夫，因此就生起无比惭愧的心，不会因为修身稍有进步就沾沾自喜，得少为足。“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如果想做一个恶人，却很容易。善人和恶人“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能够把持住自己的德行操守，就能够向上攀登，进而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如果放逸自己，懒散、放纵、任性、为所欲为，就成为恶

人。而要向上攀登，“分寸不得上”，进一步都非常难，要克服很多诱惑。“失势，一落千丈强”，就像爬山的时候，一旦脚踩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会非常迅速地坠落。人能想到这点，才能心怀恐惧，以战战兢兢的心态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

明朝历史上有一位官员张恭懿。他刚到都察院任职时，廷相王台长对他非常器重，觉得他是可塑之才，所以特别提点他，对他讲：昨天下过雨之后，我出门看到一车人穿新鞋下了车。他们从灰厂经历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雨后的地很泥泞，因为他们穿着新鞋，因此开始时都择地而蹈，即选择比较干的地方踩下去，恐怕自己的新鞋被泥水染污了，非常小心谨慎；但是他们到了贯城后，土地愈来愈泥泞，偶然一次把鞋沾脏了，就不再

像以前那样顾惜自己的鞋子了。王台长接着说：“居身之道，亦犹是尔；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为官、修身之道也是如此，就如同鞋沾上了泥水，第一次被染污之后，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了。这里“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非常值得人警醒。人如果第一次把持不好自己，例如第一次收了贿赂，或犯下邪淫，以后恶事连连，就不再顾惜了。张恭懿非常感激王台长对他讲的这一番话，把它视为金玉良言终身谨记。这个典故就是提醒人一定要慎初。人在没有作恶之前，能够严守自己的节操。但是第一次放纵之后，就可能一错再错，很难像以前那样把持自己的操守了。

修身除了慎初之外，还要慎微、慎独。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在清朝时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

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微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取与不取之间，既表现出对百姓的态度和利害，也体现出自己为人的名节与价值。这篇微文既简洁又深刻，可谓为官的金墙铁拒。张伯行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被公认为“江南第一清官”。“一丝一粒，我之名节”提醒人要“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为官者只有明白手中的权力是服务人民的工具而不是谋图私利的手段，轻于攫取、淡泊名利，才能始终保持一种宠辱不惊的坦荡心态。为官者能否守身如玉，不为物惑、不为利诱，关键在于能够慎微、慎独，戒止贪心，做到“穷不易节，达不失廉”。

贪可以腐蚀人的灵魂，一切良心、原则，在膨胀的贪欲下均化为乌有。而贿赂得逞的奥秘也就在于人的贪欲。徐元瑞在《史学指南·吏员三尚》中讲：“尚廉，谓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礼物），不受贿赂，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认为不正当），皆谢却之。”甘心淡薄即淡泊以明志，绝意纷华即避免玩物丧志，不纳苞苴是说不收受馈赠礼品，不受贿赂则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避免非议。这些才是崇尚廉洁的表现，可谓一语中的。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提醒人，要克服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等贪欲、恶习，开始都不容易，一旦让恶念相续之后，必将酿成大祸。正如《尚书》所言：“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人了解到这一点，才不敢造恶。《周易》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恶之人不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就连子孙后代也会因自己的恶行而受到消极影响，遗臭万年。所以真正慈爱后代之人，一定能克念作圣，为后代子孙留下个好名声，千古流芳。



晚清教育家匡源与 涿源书院

□ 孙晓梅

匡源，清代胶州人，出生于1815年，匡源13岁中秀才，25岁中进士，入选翰林，不久又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34岁入职上书房为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讲经。以后短短十几年里，受到朝廷高度信任，历任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乃至咸丰帝临终托孤而加封赐的赞襄政务大臣。在整个清王朝的汉员中，能够做到赞襄政务大臣的，匡源是第一人。但在辛酉政变中他被革除了一切职务。身处逆境的匡源仍自强不息，立身教坛，在清代山东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为齐鲁大地传承圣贤文脉、培养栋梁之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匡源被革职返乡途经济南时，路费已经告罄。当时山东巡抚阁敬铭是匡源的门生，他十分佩服其学识和人品。阁敬铭非常重视教育，他诚聘匡源出任涿源书院院长。

办好教育不光有好老师，更得有好院长。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颁布谕旨，将书院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而后又对书院的院长、生源、规则、课程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凡书院之院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範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能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匡源在《涿源书院课艺》中提到：“余自己丑春来主讲席，也就是1865年出任山长。匡源任山长时期是涿源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他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在短时间内便延揽了一批名儒硕师至书院任教，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之中，亲自传道授业。除了担任涿源书院山长，匡源又应丁宝桢之聘担任尚志书院首任山长。身兼两院山长，这在涿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惟匡源如此。

匡源担任山长以来，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志，孜孜坎坎，扶持后进，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他常说：“读书而取科第乃分内事，必求所以重科第者，愿诸生更有进也。”旨在告诫学生，生当盛世，应明德静心，肩负起治理国家和百姓的责任，要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乾隆十三年，涿源书院制定了《训课条规》，提出“为学莫先于立志，为学莫要于寡欲，为学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为学当慎交”，匡源的教育理念也秉承书院“为国储才”的办学宗旨。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匡源选辑编印了多册教材，当作范文供学生使用。1867年，匡源刻印了《涿源书院课艺初编》及《涿源书院课艺二编》。1869年，匡源编刻了《涿源书院课艺三编》，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为之作序。丁宝桢在序中写道：“匡鹤泉先生主涿源书院

讲席，日与肄业诸生考正文体……每月课艺多或至数百卷，必手自评点，详加删削，若塾师之教弟子，然其引诱后进用心可谓至深切矣。”可见，匡源亲自授课并且课时也非常多。1880年，匡源编选了《小题新编初刻》，选文50余篇，以供童试者读。1883年，朱学笃续辑匡源所选而未成之涿源书院《小题新编续刻》，共得文60余篇。教育学生秉持勤勉的躬耕态度。他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对待经义理“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居敬持志”。

匡源从政阅历丰富，曾出任乡试考官和会试同考官，掌握选人用人政策和标准。推进创新。匡源为《小题新编初刻》作序：“吾故与之言信，乃取近人名作，细加评阅，共得文五十余首，因顾之曰‘小题新编’。夫所谓‘新’者，非惟向金奎玉，韵叶宫商之谓（即选文体裁、题材、出处、论理、行文等），谓其理新、意新、笔新、局新，令阅者一览其文，耳目为之一新焉”，可见他非常支持文章创新。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匡源根据学生水平的高低、天赋的大小和闻道的先后分类施教，以独到的教学方式和深入浅出的讲述，对学生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方法上多加指导，力求使更多的学生成为栋梁之才。在他的指导下，学生进步很快。匡源担任山长17年，从学弟子达到3000人，外省慕名前来求学者无数，培养出举人、贡生、拔贡等400余人，其门生中成名者多至百有，有状元曹鸿勋、尚书张应麟、黄钰，翰林杨际清、法伟堂、柯劭忞等一批得意门生，成果之盛在清朝历史上少有。其中，法伟堂是胶州人，1889年中进士，授国子监学正銜武定府教授。后任青州海岱驻贤书院讲席总教，历时10余年，培养造就了许多人才，声望颇高。清末任济南师范教育所所长、《山东通志》总纂，著述甚丰，亦是名师。柯劭忞也是胶州人，他慕匡源大名入尚志书院，历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典礼院学士，曾是溥仪的帝师。他独立撰著《新元史》，参加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曾担任清史馆代理馆长、总纂，编成了《清史稿》。

1881年，匡源病逝于涿源书院，门生曹鸿勋为其立教恩碑，述其传道、授业、为育育才的丰功伟绩。较之从政的辉煌，其教育生涯对山东的影响更是深刻，他的门生故吏遍及全国各地，在这块土地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华阳国志》

□ 马龙祥

历史文化
典籍

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其成书于公元348—354年之间，因地处华山之阳而名。此书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与民族关

系的丰富内容，是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历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的特点

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小亭乡（今四川崇州三江镇）人。常姓为蜀中文学大族，族人多习文艺，因而常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六艺、善文辞、通经史。公元304年，李雄在蜀中建立成汉政权后，常氏一族受到招抚，常璩亦入仕成汉为史官。后桓温伐蜀灭亡成汉政权后，常璩降徙建康，进入朝廷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秘阁掌管著作之事，又为他从事《华阳国志》撰写提供了方便。常璩入建康后，受到东晋中原士族排挤，郁郁不得志，晚年无心仕途，专心文史。常璩参考其从祖常泰恭所著《梁益篇》《蜀后志》《后贤传》三书，以及陈承祚的《蜀书》《耆旧传》，杜敬修的《蜀后志》，参以祝元灵、陈中伯的《续耆旧》，黄容的《梁州巴纪》，并《南裔志》等著作，孜孜不倦，综揽未备，广为考证，耗时十数年，著成《华阳国志》一书，旨在赞誉巴蜀文化之悠远、人物之风流，驳斥建康权贵和士大夫对蜀人的轻藐。

《华阳国志》全书约11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后贤志》等内容，末卷为序志等内容。在内容及编撰方法上，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中提到，《华阳国志》一至四卷主要记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古籍专家刘琳认为：该书“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但正是因为这种编纂体例，也有学者质疑其并非一部地方志，而是地方史。例如史学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支持该观点的还有谭其骧、王定璋等。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确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例如，清代洪亮吉谓汉晋蜀史《越绝书》《华阳国志》为方志之始。清代方志家刘光谟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史学家李泰棻在《方志学》中说：“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梁启超、朱士嘉、傅振

伦、张舜徽、杜泽逊等也认为《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专门的研究著作如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刘重来的《华阳国志研究》等也都持此观点。

文化、历史与人物研究

《华阳国志》为研究公元4世纪前西南地区地理沿革、经济文化、民族历史、历史人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地理方面，《华阳国志》详细叙述郡县沿革、户口多寡、山川道路等。例如，卷一《巴志》对巴东郡鱼复县的历史沿革记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曰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有橘官、盐泉。又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旁即雨也。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故基。”还有卷三《蜀志》键为郡下的武阳县以及战国时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过程，这些记载多为其其他史料所缺略，《华阳国志》正可补其阙。

在经济文化方面，《华阳国志》记载各地的风俗民情、山水物产、祠庙古迹、神话传说、家族大姓等。例如，卷一《巴志》序言中列举巴地的特产包括：桑、蚕、麻、纁、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茭，蔓有辛药，园有芳葵、香茗、给客橙、葵”，记载十分详细。《华阳国志》也记载了巴、汉中、蜀、南中各地祠庙古迹，包括：鱼凫祠、杜宇祠、竹王三郎祠、大禹祠、涂后祠、汉武帝祠、铁祖庙祠、天马祠等，反映了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以及对中央王朝的认可 and 敬畏。此外，《华阳国志》还收录当地歌诗谣谚42首，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西南地区的政风、祭祀和乐舞等。

在民族历史方面，《华阳国志》记载的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史料亦极为丰富，涵盖了30多个民族的族称分布、风物民俗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涉及巴、蜀、氏、羌、叟、賨、濮、管、冉駹、共、摩沙、鸠僚、身毒、滇、夜郎、哀牢、螭夷等，在记载少数民族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拓展，其中许多民族或部落为他书所不载，对研究西南民族历史大有裨益。在历史人物方面，《华阳国志》对于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等割据政权的君主大臣事迹也多有著述。例如，李严被废事件与蜀汉后期政治颇为密切，而《三国志》失之太略，《华阳国志》的记载却更为详细。还有，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的行军路线、具体过程和战后措施等相关史料也十分珍贵。

尤为可贵的是，常璩将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等地区或有才干贤德的妇女写入《华阳国志》。自从孔子提出“唯女子与

小人难养也”之后，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妇女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常璩却冲破这一思想藩篱，为妇女立传。他认为“烈士贤女，高勋足以振玄风，贞烈可以方藁馨者，奕世载美”。常璩史无前例地将妇女与士人合并于方志中，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妇女立传的先河，完善了地方志从内容到结构的编撰体例。他在《华阳国志》中赞颂蜀、巴、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六郡妇女49人，使地方史志的人物传记更加充实完整，为后世研究两汉时期的婚姻史、妇女史以及西南地区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史学理念

《华阳国志》不仅展现出宝贵的史料价值，其史学理念也颇为瞩目。

大一统理念。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乾坤混始，树君立王。天工人代，万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重王。苟非其器，穷高必亢。”即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天下统一。常璩不仅在书中宣扬大一统思想，还身体力行地践行这一思想，所以当东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便力促成汉君主降晋，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书中还在血缘脉络上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子孙，在地缘空间上极力阐述巴蜀、南中、汉中与中原地区的历史渊源和密切关系，说明巴蜀人民和中原人民都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不能分割的统一整体。

以民为本理念。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不仅记录帝王将相的历史，还不惜笔墨地赞扬如彭非、谢姬等庶民百姓的优秀事迹。在书写巴蜀文化时，将许多歌谣俚语收入书中，以展现民众创造的文化，表达了对民众疾苦的关注，并揭示出民众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

人强胜天的哲学理念。常璩作为接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学者，他的哲学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记。《华阳国志》虽然含有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成分，但他并非完全承袭前人学说，而是凭借深邃的史学功底和强烈的济世情怀，对前人学说加以利用改造，强调人事的作用，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到能超越天、战胜天的高度。

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昫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可见，《华阳国志》作为地方士人独立完成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及深刻的史学思想全面、准确、详尽地描述了巴蜀大地的历史进程与沧桑巨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